

苏飞, 刘又嘉, 童磊, 郑珂. 2024. 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热带地理, 44 (7): 1279-1288.
Su Fei, Liu Youjia, Tong Lei, and Zheng Ke. 2024. The Measurement of Translocal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ropical Geography*, 44 (7): 1279-1288.

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苏飞, 刘又嘉, 童磊, 郑珂

(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 “跨地方”成为城乡联系的新常态, 其对乡村家庭生计韧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乡城跨地方”是当前乡村家庭的主流形态, 识别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特征, 探究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对乡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 为乡村家庭生计韧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以丽水市4县区6村庄为案例, 量化测度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 并与非跨地方家庭做了比较研究, 解析了乡城人口流动影响下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乡城跨地方流动能够显著增强交通区位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乡村家庭韧性水平, 但对整体发展水平较高的乡村而言, 这种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有限; 2) 乡城跨地方流动的关键在于家庭成员流动后所传递的信息流大大提升了家庭所接受到的知识环境和信息环境, 进而通过优化其学习能力提升家庭生计韧性水平; 3) 这种由于人口流动所获得的信息环境改善, 其影响作用大于资金流, 而物质流则与此类家庭生计韧性水平无显著相关性; 4) 除信息流之外, “外出人口比例”“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外出人口收入比例”也是影响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城乡融合; 跨地方家庭; 生计韧性; 丽水市

中图分类号: F307.1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3284/j.cnki.rddl.20230401

文章编号: 1001-5221(2024)07-1279-1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改革开放40多年来, 中国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已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 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 形成独特的人口流动路径和城乡发展模式, 产生复杂多样的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 增强了乡城的联系, 并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陈明星等, 2019; 刘彦随等, 2019; 邓祥征等, 2020)。学者将这种“乡城”“城乡”要素相互流动的现象称为“跨地方流动”, 并将其解译为“连接移民原籍地和目的地的多维社会空间的动态、联系和相互依赖性”, 或将其作为一种概括性术语来描述移动性和多种形式的空间连通性(Peth and Sakdapolrak, 2020)。

“跨地方”打破了传统的“容器空间思维”, 不仅关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二元空间, 也注

重研究二者之间的“连接”, 从跨地方视角考察各类生计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 及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是生计研究的新兴领域(Scoones and Borrás, 2009)。而目前生计研究主要聚焦在生计脆弱性(童磊等, 2020)、生计韧性(Tanner et al., 2015; 李玉恒等, 2019)、生计适应(赵雪雁等, 2020)、生计政策(杜巍等, 2018)等视角, 其中生计韧性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涵盖生计脆弱性和生计适应性的相关内涵, 且更具系统性。关于农户生计韧性评价已有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Jacka, 2017)和评估方法(Borgatti et al., 2009)。事实上, 韧性研究是推动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工具(Walker et al., 2004; Adger et al., 2005; Folke, 2006), 为生计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部分学者已关注到“跨地方性”与“生计韧性”的交叉研究, 探讨了乡到乡

收稿日期: 2023-05-29; **修回日期:** 2023-08-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59)

作者简介: 苏飞(1982—), 男, 安徽颍上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规划研究, (E-mail) suf910@163.com;

通信作者: 童磊(1989—), 男, 浙江龙游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城乡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 (E-mail) zjutonglei@126.com。

(Adger et al., 2009), 城到城 (Romankiewicz, 2019), 乡到城 (de Brauw, 2019) 多种不同的迁移情况, 也探讨了这种跨地方迁移对家庭生计水平的影响 (Tebboth et al., 2019; Peth and Sakdapolrak, 2020)。但已有研究仅关注单一流入地、流出地农户生计水平, 忽视了农户迁移所形成的连接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跨地方社会网络, 以及这种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鉴于此,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丽水市典型村庄为研究区域, 以乡城流动所形成的跨地方网络为依托, 以农户家庭为基本单位, 重点探讨这种同一个家庭内部所形成跨地方网络对农户家庭整体生计影响的效用、路径和机制。以期为跨地方社会网络与农户生计水平这一交叉研究领域提供新思路。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丽水市地处浙江省西南部, 市域面积 1.73 万 km², 山地面积占比 90% 以上, 下辖 9 个县 (市、区), 总人口 270 万, 是浙江省第二大人口外流城市, 乡城流动特征明显。综合考虑村庄地理特征、交通状况、经济水平以及村民主要从事产业等因素 (刘永茂等, 2017; 刘彦随等, 2019; 张行等, 2020), 根据代表性、典型性原则, 选取莲都区新陶村、吴垵村、松阳县黄南村、缙云县东方村、庆元县百山祖村、熏山下村 6 个村作为研究样本。为确保数据的多样性和可靠性, 本文所选样本村中涵盖了农业型、工业型、旅游型等多种不同类型的村庄。

1.2 数据来源

本文中部分评价指标数据通过访谈和问卷, 以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取。共调查农户 239 户, 深入访谈 30 余人, 每位参与者访谈时间约 20~30 min, 回收有效问卷 232 份, 问卷有效率 97.1%。其中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农户为 140 户, 占调查总户数比例为 60.3%。另有部分数据来源于 2021 年《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局等, 2021)《丽水统计年鉴》(丽水市统计局等, 2021) 等, 缺失数据通过各县域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完善。调查内容涵盖家庭基本情况、家庭生计资本拥有情况、家庭生计方式、家庭社会关系特征等 4 个维度, 包含“人口结构”“家庭成员年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等指标。

2 研究方法

2.1 家庭生计韧性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 借鉴 Speranza 等 (2014) 提出的生计韧性概念和分析框架, 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 3 个维度选择 19 个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变量。缓冲能力主要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自然资本指农村居民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存量, 能反映农村家庭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状况; 人力资本是生计的重要基础, 代表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 物质资本指用于经济生产过程中除去自然资源的物质, 是缓解风险影响的基本保障; 金融资本是缓解冲击的最关键因素, 经济收入越多, 储蓄越多, 家庭面临冲击的应对能力越强; 社会资本指家庭用于谋生的社会资源, 是缓解冲击的突破口。

自组织能力与社会关系网络、组织内部和谐程度, 以及组织成员在社会网络中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密切关系。在社会网络中, 亲友邻里的紧密促进合作协作、资源共享、信息沟通等过程, 而家庭内部的和谐程度及家庭成员幸福感, 有利于提升自组织内部的稳定性。组织成员拥有更乐观的生活态度, 将促进其参与社会网络中的活动, 提升其自身与社会网络之间的互动水平。公共参与是提升自组织的突破口, 政治地位会影响获得资源的能力以及对村中事务的决定权力。

学习能力包括认知能力、获取能力和共享能力。其中, 认知能力由家庭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表征, 受教育程度越高, 在家庭中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越高, 面对风险的认知能力和应对能力也更强。获取能力与职业技能培训程度有关, 家庭中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与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水平, 也表达家庭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重视程度以及对知识的渴望程度。共享能力指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与技术交流水平, 信息技术上的交流可促进家庭成员的学习沟通及信息技术共享, 从而提升家庭的学习能力。

已有研究表明, 跨地方网络会对不同类型的家庭产生不同的影响 (Mersha, 2018), 这种影响与家庭规模 (Ehirim et al., 2012)、社会资本 (Syafitri, 2012)、农村迁移决策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劳动力流动后, 可能通过亲友帮助网获得支持和帮助, 以提高他们在流入地的适应能力。同时, 他们也会在

流入地积极开展社交活动，逐步融入流入地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新环境中拓展他们的社会网络，并积极学习新的信息、知识等，然后通过远程信息传递的方式，将新获得的信息、知识以及其他资源传递回流出地的家庭成员，进而影响流出地家庭成员的生计韧性水平。这些指标的变化反映劳动力流动对

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增加多个有关社会网络以及联系强度性质的指标，用以适配跨地方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评价，包括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保障网、亲友帮助网，共享能力中的信息技术交流等。最终确定乡村家庭生计韧性指标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家庭生计韧性指标评价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icators

维度	一级指标	测度指标与作用方向	指标描述与赋值
缓冲能力	自然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	家庭中耕地面积与家庭总人数之比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家庭中劳动力占家庭总人数比例/%
	人力资本	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	不健康=1,不太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5
		家庭患病人数(-)	家庭中慢性病、重症病患者数量
	物质资本	住房类型(+)	无住房=0,土木房=1,砖木房=2,混凝土房=3
		人均住房面积(+)	家庭住房面积与家庭总人数之比
		耐用消费品种类(+)	家庭拥有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等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
	金融资本	人均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与家庭总人数之比
		人均年支出(-)	家庭年支出与家庭总人数之比
	社会资本	收入多样性(+)	家庭收入来源种类
社会保障网(+)		家庭享有保险和政府帮扶政策的种类	
自组织能力	内部和谐	家庭内部和谐度(+)	家庭内部关系:非常不和谐=1,不太和谐=2,一般=3,比较和谐=4,非常和谐=5
		家庭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1,不太幸福=2,一般=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
	关系网络	亲友邻里紧密度(+)	与亲友邻里来往频率:从不往来=1,不太来往=2,偶尔来往=3,经常来往=4,频繁来往=5
	公共参与	政治地位(+)	家中有无村委会成员:无=0,亲戚中有=1,有=2
学习能力	教育程度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0,初中=1,高中/中专=2,大专=3,大学本科=4,硕士及以上=5
	获取能力	职业技能培训(+)	家庭中劳动力是否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是=1,否=0
	共享能力	信息技术交流(+)	家庭间是否存在信息与技术交流:是=1,否=0

注：+表示正向作用，-表示负向作用。

2.2 数据处理

综合运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法、结构方程模型等数理分析方法，对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进行量化测度，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差异特征，以及人口流动背景下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影响因素，计算公式参见文献（Hahn et al., 2009; Yang, 2018）。

3 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特征

3.1 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测度结果分析

研究区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整体适中，其平均值为0.304，最高为0.628，最低为0.043。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及各维度指数箱线图（图1）显示，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分布较为均衡，高于平均水平的跨地方家庭数量占样本总量的50.7%。而缓冲能力指数的中位数接近中心位，自组织能力的中位数接近下三分位，学习能力的中位数接近上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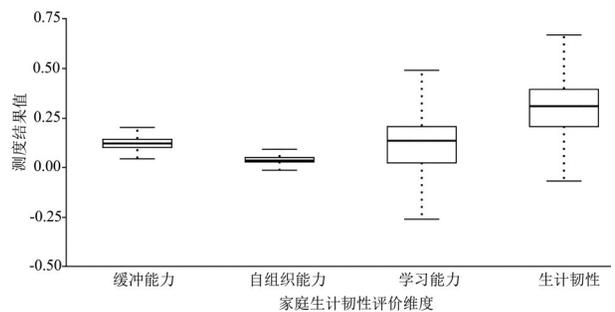


图1 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及各维度指数

Fig.1 Rural-urban translocal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al indices

位，表明跨地方家庭缓冲能力分布均衡，跨地方家庭的自组织能力呈现较显著的低值集中态势，学习能力呈现较显著的高值集中态势。访谈中也发现，由于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跨地方家庭与外界交流较多，获取信息、技能的渠道也较多，且重视职业技能，积极进行培训，故整体学习能力较强。

3.2 乡城跨地方家庭与非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对比分析

研究区跨地方与非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如表2所示,农户生计韧性水平整体适中,平均值为0.281,其中,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平均值为0.304,非跨地方家庭为0.245,两者间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学习能力方面。这表明外出口作为乡村家庭与城市间的沟通桥梁,在一定程度上会将城市先进的思想,如对学习和技术的重视,传播回乡的家庭中;乡村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其跨地方家庭与非跨地方家庭条件相差较小,缓冲能力较为接近;由于非跨地方家庭成员均生活在乡村中,亲友邻里紧密程度和家庭内部和谐度以及在村中公共参与程度都更高,因而其自组织能力高于跨地方家庭。

表2 跨地方与非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对比

Table 2 Translocal versus non-translocal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家庭类型	缓冲能力	自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	生计韧性
跨地方家庭	0.122	0.049	0.133	0.304
非跨地方家庭	0.117	0.053	0.075	0.245
均值	0.120	0.051	0.110	0.281

通过比较不同村庄跨地方家庭与非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发现不同发展水平的村庄家庭生计韧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指数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东方村(0.327)、百山祖村(0.315)、吴垵村(0.313)、黄南村(0.299)、熏山下村(0.290)、新陶村(0.270)。而非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指数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吴垵村(0.290)、东方村(0.239)、熏山下村(0.220)、百山祖村(0.214)、新陶村(0.192)、黄南村(0.178)。非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与村庄的区位、经济、旅游业及工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松阳县黄南村地处偏远,以发展农业为主,属于低收入村,黄南村中非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排名最末,且跨地方家庭与非跨地方家庭间生计韧性指数均值相差最大。而吴垵村位于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区位优势,周边工厂较多,属于高收入村,其非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排名最前,远高于其他村庄,且吴垵村中跨地方家庭与非跨地方家庭间生计韧性指数均值相差最小。东方村、熏山下村与吴垵村类型相似。此外,新陶村虽然与熏山下村同样地处偏远,交通便利程度较低,但村内发展旅游业,部分村民通过开

民宿、农家乐、超市等途径获得较好收入,经济水平有了提升,其生计韧性水平排在吴垵村、东方村、熏山下村之后,黄南村之前。

跨地方家庭的整体生计韧性水平受村庄发展水平影响程度有限。由于位于近郊区,距离县城/市区仅10 min以内车程,生活水平接近城市家庭,熏山下村与吴垵村的缓冲能力水平最高,而百山祖村中大量村民外出务工,村中人口老龄化严重,其缓冲能力水平最低。百山祖村和新陶村中跨地方家庭多为子女外出务工,父母留在乡村的模式,家庭和谐度较高,且地处景区内部,生活幸福感较强,其自组织能力水平较高。东方村和吴垵村周边工厂较多,其家庭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技术的重视程度较高,学习能力较强。

由此可知,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与村庄交通便利程度、经济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但跨地方家庭与非跨地方家庭间生计韧性水平差异,随着村庄交通便利程度、经济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流出地乡村条件越差,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于家庭生计韧性水平提升的意义越大。

4 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影响因素分析

4.1 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主要影响因素识别

4.1.1 变量选择 从家庭中人口外出务工行为导致的资金流动、物质流动、信息流动3方面和外出人口特征共4方面选取15个变量,探究人口外出务工对家庭生计韧性影响(表3)。

4.1.2 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跨地方网络对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特点及关键影响因素,将外出人口占比、流动距离、流动时间、外出人口年龄、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外出人口收入、外出人口职业、外出人口收入比例、汇款频率、汇款占比、通话频率、信息交流度、寄物频率、寄物内容、外出人口职业培训等作为自变量,将生计韧性作为因变量进行Ridge回归(岭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表4),模型 R^2 为0.654,意味着跨地方家庭中的人口流动、资金流动、物质流动、信息流动特征可解释生计韧性的65.4%的变化原因。模型的 $P=0.00$, <0.05 ,表明模型有意义,拟合性较好。

拟合结果表明,外出人口比例、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和信息交流度均通过显著性影响($P<0.01$),表明跨地方家庭中外出

表 3 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变量选择及赋值

Table 3 Variable selection and assignment of translocal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维度	指标	指标描述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人口流动	外出人口比例	家中外出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0.492	0.151
	流动距离	外出人口务工地与家乡平均距离/km	316.321	307.133
	流动时间	外出人口平均外出务工时间/a	5.737	4.807
	外出人口年龄	外出人口的平均年龄/岁	35.554	8.853
	外出人口学历	外出人口的平均学历:小学及以下=0,初中=1,高中/中专=2,大专=3,大学本科=4,硕士及以上=5	2.071	1.110
	外出人口工作稳定性	行政人员+2,企业员工及技术人员+1,经商+0.5,其他+0	0.679	0.939
资金流动	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	外出人口接受职业培训次数/次	0.443	0.499
	外出人口收入	跨地方家庭中外出人口的年收入/万元	8.687	9.496
	外出人口收入比例	外出人口收入占全家收入的比例/%	62.479	24.849
	汇款比例	外出人口汇款数占外出人口总收入比例/%	35.293	29.560
物质流动	汇款频率	外出人口每年向家庭汇款次数/次	4.807	4.602
	寄物频率	外出人口与家庭之间每月寄送物品次数/次	0.879	1.210
	寄物种类	外出人口与家庭之间寄送物品种类/类	0.757	0.936
信息流动	通话频率	外出人口与家庭之间每月通话次数/次	2.768	1.603
	信息交流度	外出人口与家庭之间交流内容信息化程度:交流内容包括新技术、新思想+2,包括外出见闻+1	0.643	0.930

表 4 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ranslocal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i>t</i>	<i>P</i>
	<i>B</i>	标准误	Beta			
常数	0.142	0.027	—		5.279	0.000***
外出人口比例	0.069	0.02	0.126		3.452	0.001***
流动距离	0	0	-0.027		-0.755	0.452
流动时间	0.001	0.001	0.046		1.277	0.204
外出人口年龄	0	0	-0.004		-0.098	0.922
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	0.01	0.004	0.097		2.663	0.009***
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	0.101	0.008	0.455		12.563	0.000***
外出人口收入	0	0	0.014		0.399	0.691
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	0.017	0.009	0.072		1.985	0.049**
外出人口收入比例	0	0	0.061		1.71	0.09*
汇款频率	0	0.001	-0.007		-0.206	0.837
汇款比例	0	0	-0.024		-0.675	0.501
通话频率	0.005	0.003	0.069		1.893	0.061*
信息交流度	0.102	0.013	0.285		7.857	0.000***
寄物频率	0.001	0.003	0.01		0.282	0.778
寄物种类	0.004	0.004	0.031		0.895	0.373
<i>R</i> ²			0.654			
调整 <i>R</i> ²			0.613			
<i>F</i>					<i>F</i> (15 124)=15.660, <i>P</i> =0.000	

注：因变量：生计韧性，**P*<0.1，***P*<0.05，****P*<0.01。

人口占比越多、家中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跨地方家庭之间交流的新思想、新技术越多、外出人口参加的培训次数越多，其生计韧性越强；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呈正相关（*P*<0.05），表明家中外出人口工作越稳定，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越强。外出人口收入比例、通话频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呈正相关（*P*<0.1），对生计韧性存在

一定正向影响，而流动距离、汇款频率、寄物频率等与生计韧性之间相关性不显著。

4.2 研究假设及模型构建

为更深入地探讨外出人口特征以及跨地方要素流动对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参考影响效应模型（张瑾等，2023）、迁移决策（Tebboth et al., 2019；李聪等，2019）等研究，提出假设。考虑到物质流

动指标对生计韧性水平影响不显著，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描述人口流动、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对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作用的路径模型（图2）。在该模型中，选择相关变量并设定如下假设：

1) “人口流动”“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被视为结构方程模型的潜在变量，不仅相互影响，且共同影响生计韧性。在该结构中，生计韧性被定义为内生变量。单向箭头表示单向因果关系，双向箭头表示2个潜在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关系，而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被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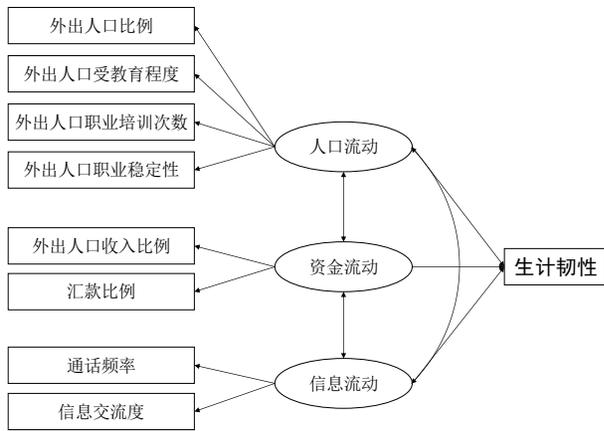


图2 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影响模型（假设）
Fig.2 Translocal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impact model (Hypothesis)

2) 在构建的15个指标中，选择影响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包括“外出人口比例”“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外出人口收入比例”“通话频率”“信息交流度”和“汇款比例”8个指标，作为结构方程模型的观测变量，即结构方程中的显性变量，前7个指标显著性较强，主要通过间接途径影响家庭生计韧性的提升。而由于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汇款是跨地方家庭生计中较为重要的环节，且为确保每个指标维度都有合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此汇款比例的显著性虽未小于0.01，但仍为资金流动中强显著的影响要素。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计算，并根据模型修正提示调试并确定最终模型（图3）。模型拟合指标如表5所示，表明模型与样本数据之间匹配度较高，模型拟合度较高。

1) 潜在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经模型检验发现，人口流动、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对生计韧性具有影响。具体而言，路径系数为1.00、-0.030和0.604，由图3可知，人口流动（即外出人口的特征）对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信息流动，而资金流动对生计韧性的影响不显著。

2) 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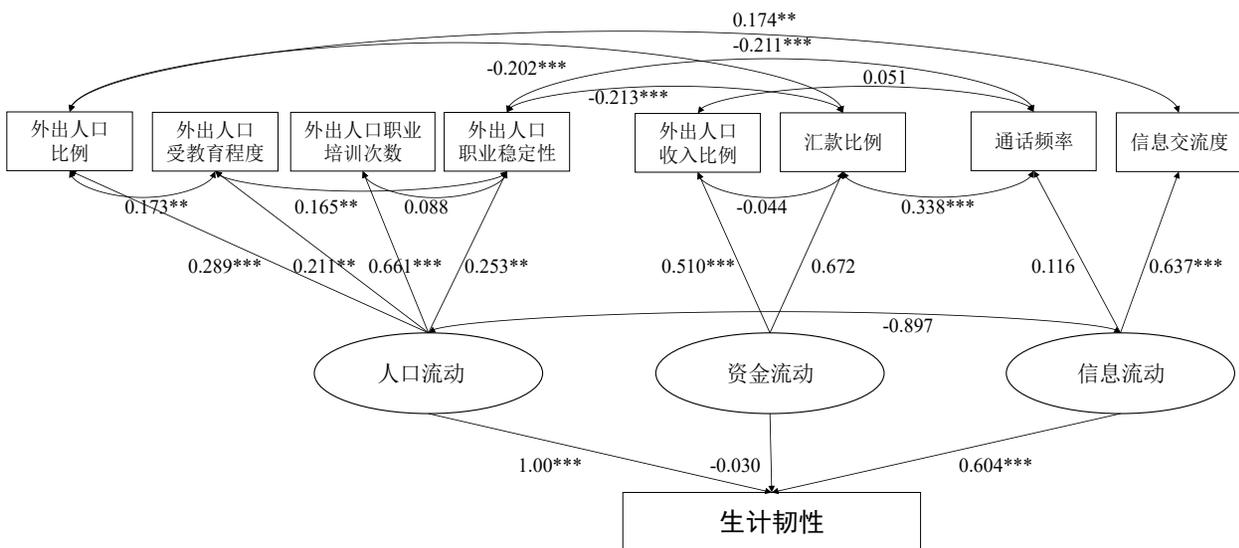


图3 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影响机制结构方程模型

Fig.3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n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translocal households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

表5 模型拟合指标
Table 5 Model fitting indicators

常用指标	判断标准	值
卡方自由度比 χ^2/df	<3	2.691
GFI	>0.9	0.961
CFI	>0.9	0.935
NFI	>0.9	0.909
SRMR	<0.1	0.055

对于人口流动与观测变量的关系，外出人口比例、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与人口流动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与人口流动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这显示外出人口比例、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以及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对外出人口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中，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最为显著。对于资金流动与观测变量的关系，外出人口收入比例与资金流动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外出人口收入比例在资金流动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在信息流动与观测变量的关系方面，信息交流度与信息流动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信息交流度的增加对提升生计韧性起重要作用。这表明，除了提升个人实力和职业技能外，外出人口也将城市的新技术和新思想引入乡村家庭中，使得家庭传统观念发生改变，对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提升家庭生计韧性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3) 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在各观测变量之间存在多种强相关性。其中，外出人口比例与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与汇款比例之间呈现负相关。此外，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与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以及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之间也表现出显著正相关，表明学历和职业技能对工作的重要性。在资金流动方面，汇款比例与通话频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通话频率高的家庭成员间的依赖性和紧密度更强，外出人口会将大部分收入汇回乡村家庭。综合来看，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外出人口比例、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外出人口收入比例、汇款比例、信息交流度与生计韧性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人口流动特征和信息流动特征是影响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并且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以丽水市4县区6村庄为案例区，识别了跨地方家庭主要特征，构建了家庭生计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分析了不同区域、不同结构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差异，揭示了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丽水市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整体水平适中，均值为0.304，高于乡村非跨地方家庭均值0.245，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学习能力，家庭成员流动后所传递的信息流大大提升了家庭所接受到的知识环境和信息环境，进而提升了其家庭生计韧性水平；2) 乡城跨地方家庭与非跨地方家庭间生计韧性水平差异随着乡村条件的上升而下降，流出地乡村条件越差，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于家庭生计韧性水平提升的作用越大，但对整体发展水平较高的乡村而言，这种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有限；3) 跨地方流动特征中，“外出人口比例”“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外出人口收入比例”“信息交流度”是影响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4) 人口流动特征对生计韧性的影响最显著、信息流动特征次之，资金流动较低，而物质流动特征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间无显著相关性。除增强自身实力外，外出人口将城市中的新技术、新思想传达至乡村家庭中，也是提升家庭生计韧性水平的重要渠道。

5.2 讨论

城乡发展正走向深度融合阶段，跨地方性特征愈发明显，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体现在人口双向流动的基础上重塑城乡关系。从跨地方视角看，研究跨地方社会网络与农户生计韧性之间的关系，揭示农村劳动力流出背景下跨地方要素流动过程及其与农户生计韧性之间的联动机制，能拓展生计研究领域的范围，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主流研究虽然关注到农户家庭，但往往以农户单一个体代表农户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农户家庭内部成员的跨地方联系，这种跨地方联系所形成的跨地方网络会对分散在2个不同空间却又是一个整体家庭生计水平产生影响，这是本研究的重点，也是相较于已有研究，本研究的创新点所在。本研究尚存一些不足之处：1) 研究区域尚不全面，所选案例区是浙江山区，对于平原地区、海岛地区等地理类型的研究尚且缺乏；

2) 研究视角相对微观, 仅聚焦在农户家庭这一微观单元, 村庄、乡村社区等更大尺度的研究仍有待探索。此外, 跨地方社会网络给乡村社区带来生计资源的同时, 也会增加其风险, 而这种风险能通过该网络扩散并影响网络中其他成员的生计水平。在掌握跨地方社会网络对家庭生计韧性及流出地乡村社区韧性的影响特征、过程和机制的基础上, 未来可提高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及乡村社区韧性水平, 以降低跨地方网络整体风险为目标, 从治理的视角研究跨地方社会网络形成的过程、管理策略以及农户迁移管控策略。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Adger W N, Ealin H, and Winkels A. 2009. Nested and Teleconnected Vulnerabilities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7(3): 150-157.
- Adger W N, Hughes T P, Folke C, Carpenter S, and Rockström J. 2005.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to Coastal Disasters. *Science*, 309(5737): 1036-1039.
- Borgatti S P, Mehra A, Brass D J, and Labianca G. 2009.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323(5916): 892-895.
- 陈明星, 叶超, 陆大道, 隋昱文, 郭莎莎. 2019.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 *地理学报*, 74 (4): 633-647. [Chen Mingxing, Ye Chao, Lu Dadao, Sui Yuwen, and Guo Shasha. 2019. Cogni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4(4): 633-647.]
- De Brauw A. 2019. Migration out of Rural Areas and Implications for Rural Livelihoods. *Annual Review of Resource Economics*, 11(1): 461-481.
- 邓祥征, 金贵, 何书金, 王成新, 李兆华, 王占岐, 宋马林, 杨庆媛, 张安录, 陈建成. 2020. 发展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地理学报*, 75 (2): 226-239. [Deng Xiangzheng, Jin Gui, He Shujin, Wang Chengxin, Li Zhaohua, Wang Zhanqi, Song Malin, Yang Qingyuan, Zhang Anlu, and Chen Jiancheng. 2020.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Development Geography Research.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5(2): 226-239.]
- 杜巍, 牛静坤, 车蕾. 2018.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生计恢复力与土地政策的双重影响. *公共管理学报*, 15 (3): 66-77, 157. [Du Wei, Niu Jingkun, and Che Lei. 2018. The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e Population's Citizenization: The Doubl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Land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5(3): 66-77, 157.]
- Ehirim N C, Onyeneke R, and Chidiebere-Mark N. 2012. Effect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on the Poverty Status of Migrants in Abia State, Nigeria. *Agricultural Science Research Journal*, 2(4): 147-149.
- Folke C. 2006. Resilience: 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6 (3): 253-267.
- Hahn M B, Riederer A M, and Foster O. 2009.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 A Pramatic Approach to Assessing Risks from C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A Case Study in Mozambiqu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9(1): 74-88.
- Jacka T. 2017. Translocal Family Reproduction and Agrarian Change in China: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7): 1341-1359.
- 李聪, 高梦. 2019. 新型城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的实证. *统计与决策*, 35 (18): 89-94. [Li Cong and Gao Meng. 2019.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New Urbanization on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s in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35 (18): 89-94.]
- 李玉恒, 阎佳玉, 刘彦随. 2019. 基于乡村弹性的乡村振兴理论认知与路径研究. *地理学报*, 74 (10): 2001-2010. [Li Yuheng, Yan Jiayu, and Liu Yansui. 2019. Research on the Cognition and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Based on Rural Resilie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4(10): 2001-2010.]
- 丽水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丽水调查队. 2021. 丽水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Lishui Municip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Survey Office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 Lishui. 2021. *Lishui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刘彦随, 周扬, 李玉恒. 2019. 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 *地理学报*, 74 (12): 2511-2528. [Liu Yansui, Zhou Yang, and Li Yuheng. 2019. China's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4(12): 2511-2528.]
- 刘永茂, 李树苗. 2017. 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研究——基于脆弱性与适应性维度.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7 (7): 147-156. [Liu Yongmao and Li Shuzhuo. 2017.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Farmers' Livelihood Diversity: Based on the Dimension of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7(7): 147-156.]
- Mersha L A. 2018. Temporary Rural-Rural Migration, Vulnerability of Migrants at The Destination And Its Outcomes on Migrant Families: Evidence from Temporary Migrant Sending Families in Quarit District, Northwestern Ethiopia. Addis Abab: Addis Ababa University.
- Peth S A and Sakdapolrak P. 2020. When the Origin Becomes the Destination: Lost Remittances and Social Resilience of Return Labour Migrants in Thailand. *Area*, 52(3): 547-557.
- Romankiewicz C. 2019. West African Migration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Translocal Perspectives on Mobility from Mali and

- Senegal. Bayreuth: University of Bayreuth.
- Scoones I and Borrás S M J. 2009. Livelihoods Persp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1): 171-196.
- Speranza C I, Wiesmann U, and Rist S. 2014. An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Ecological Dynamic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8: 109-119.
- Syafitri W. 2012. Determinants of Labor Migration Decisions: The Case of East Java, Indonesia. Kassel: Kassel University.
- Tanner T, Lewis D, Wrathall D, Craddock-Henry N, Huq S, Lawless C, Nawrotzki R, Prasad V, and Rahman M A. 2015.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Nature Climate Change*, 5(1): 23-26.
- Tebboth M G L, Conway D, and Adger W N. 2019. Mobility Endowment and Entitlements Mediate Resilience in Rural Livelihood System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54: 172-183.
- 童磊, 郑珂, 苏飞. 2020. 生计脆弱性概念、分析框架与评价方法. *地球科学进展*, 35 (2): 209-217. [Tong Lei, Zheng Ke, and Su Fei. 2020. Concept, Analysis Framework and Evaluation Method of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35 (2): 209-217.]
- Walker B, Hollin C S, Carpenter S R, and Kinzig A. 2004.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9(2): 5.
- Yang H. 2018. Complex Effects of Telecouplings on a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 Michigan, USA: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 张瑾, 王婷, 吴晶, 乔学忠, 胡海胜. 2023.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自然资源学报*, 38 (2): 545-560. [Zhang Jin, Wang Ting, Wu Jing, Qiao Xuezhong, and Hu Haisheng. 2023. The Livelihood Effe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38(2): 545-560.]
- 张行, 陈海, 耿甜伟, 史琴琴, 刘迪. 2020. 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户生计恢复力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陕北米脂县石沟镇为例.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36 (1): 100-106. [Zhang Xing, Chen Hai, Geng Tianwei, Shi Qinqin, and Liu Di. 2020.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A Case Study of Shigou Town, Mizhi County,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Ge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36(1): 100-106.]
- 赵雪雁, 介永庆, 何小凤, 母方方, 苏慧珍, 兰海霞, 薛冰. 2020.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30 (1): 140-149. [Zhao Xueyan, Jie Yongqing, He Xiaofeng, Mu Fangfang, Su Huizhen, Lan Haixia, and Xue Bing. 2020. Study on the Adapt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under Multiple Pressure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30(1): 140-149.]
- 浙江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2021. 浙江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Zhejiang Provinci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Survey Office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 Zhejiang. 2021. *Zhejiang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作者贡献声明:

苏 飞: 论文选题、研究设计、初稿写作、论文校核与校对;

刘又嘉: 数据整理与分析, 初稿写作、论文校核与修改;

童 磊: 研究设计、论文校核与修改;

郑 珂: 文献整理、数据整理与分析、初稿写作。

The Measurement of Translocal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Su Fei, Liu Youjia, Tong Lei, and Zheng Ke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phas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local mindset has been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It has also been found that factors such as urban-rural factor flow,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have a series of effects on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Therefore, identifying rural-urban translocal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ing the rural-urban population impact influx on rural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are important guideline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related to new urbanization, regional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field research in six villages spanning four counties and districts in Lishui City to identify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ocal households. It constructed an indicator system encompassing buffering capacity, self-organization, and learning ability, employed advanced mathematical methods such as the entropy method,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translocal families,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loc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nsloc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mobility. In addi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most recent and pre-eminent scholarly works, profoundly incorporating their insight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enhances the theoretical lens for examining the resilience of urban-rural cross-regional household livelihoods, but also provides a rigorous scientific basi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These authoritative reference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empirical robustness, serve as a crucial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validation for this research, thereby assuming paramount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the advance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study background,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cited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this study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Urban cross-localit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rural families with poor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and average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for rural areas with better overall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such rural-urban population migration is limited. The overall level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urban cross-regional families in Lishui is moderate, with a mean score of 0.304, which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mean value of 0.245 for non-cross-regional rural families. This differen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earning abilities of the family members. 2) The key to rural-urban cross-locality migration lies in the information flow transmitted by family members after migration. This greatly enhances 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family, further increasing their livelihood resilience by optimizing their learning ability. The improvement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btained through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family livelihood resilience level than capital flow, whereas material flow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3) In addition to information flow, factors such as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 level of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al s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number of vocational training times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income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re also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cross-locality families. 4)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flow characteristics on resilienc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ollowed by information flow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capital flow's impact is relatively low.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aterial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level of resilience of cross-regional family livelihoods. Besides strengthening their own capabilities, migrant workers conveying ideas and information about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city to rural families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esilience in family livelihoods.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ranslocal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Lishui City